[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4.11.020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方法论思考

魏海香

（北京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在整体上面临三重困境，要突破困境，必须对其进行当代重构。批判性重置前提性预设、提出和研究新问题、形成解决新问题的新分析框架、形成概括新事实的新范畴等，在方法论层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四个相互联系的逻辑环节。在我国学界，已经出现的一些重要突破点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思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K0；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4）11-0098-06

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热点。这一研究曾一度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每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解读。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在整体上却面临三重困境，要突破困境，必须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本文拟从方法论层面，就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原因、逻辑环节与重要突破点等问题陈一管之见。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原因

应该承认，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既有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基本内容的挖掘及对该理论方法论意义的阐释。而在当代，无论是解释纷繁复杂、真伪莫辨的“全球化”理论，还是回应当代世界历史进程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既有的世界历史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令人遗憾的“乏力”感。这种“乏力”直接来自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所处的三重困境，这三重困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直接原因。

（一）困境一：没有摆正“世界历史”与“全球化”间的关系，致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存在合法性被削弱。为什么需要摆正“世界历史”与“全球化”间的关系？因为从学界探讨的现实情况来看，当代的“世界历史”理论总是围绕着各种“全球化”理论兜圈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向“全球化”理论研究转移的趋向。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全球化”与“世界历史”是等同的吗？如果等同，为何会有两种理论？如果不等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可以作为一种解读“全球化”的理论？甚或其是否可以被“全球化”理论取而代之？导致学界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的深层原因在于，多数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共识：“世界历史”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是“世界历史”。正是这种所谓“共识”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越来越仅仅成为全球化研究的一种旧的理论资源了。这种所谓“共识”既错误理解了全球化，更错误理解了世界历史，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堵塞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发展路径。从方法论上看，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全球

收稿日期：2014-06-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KS017）；北京工商大学科技创新平台项目（PXM2014_014213_00048）

作者简介：魏海香（1975-），女，河北藁城人，博士，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化是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种现象与一种趋势，绝不能将两者简单划等号，否则，对当代社会也广泛存在的反全球化和非全球化的事实又该如何解释？因此，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进而科学构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导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逻辑环节。

（二）困境二：囿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局限。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各类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著述在中国学界被广泛翻译和介绍。应当承认，这些翻译和介绍是必要的，当代西方的各种全球化理论也确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我们缺乏批判性的借鉴，致使学界的相关研究无法突破西方学界的话语模式，从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困境。其主要表现是：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已陷入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窠臼，由于束缚于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范式和话语，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了，充其量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相关词汇中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一种转述。这不仅会引起我国学界相关理论探讨的混乱和滞后，更有可能导致实践中的危害。从方法论上来看，西方“全球化”理论尽管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但它们毕竟是形成于西方的社会和学术背景，对其照搬，当然“经济”和方便，但“东施效颦”损害的是我国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此外，具体到某种西方“全球化”理论科学与否，还有待甄别。实际上，连一些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全球化”范畴及其理论被“过度贩卖了”[1]。近年来，西方学界已经开始了这种反思，甚至出现了“去全球化”浪潮。先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仅就其中所包含的对既有“全球化”范畴及其理论的批判精神，就值得我们借鉴。最后，既有的各种西方“全球化”理论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如果我们一味照搬，就难免不会堕入其中的“陷阱”。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摆脱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困境与打破西方“全球化”理论的束缚，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三）困境三：与当代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一样，目前学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原始创新乏力，没有形成能够解释当代世界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新范式。世界历史发展至今，已经出现很多新现象，涌现了许多新问题，如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联系日趋广泛、快速和紧密的同时，不平衡发展也日益凸显，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家、非政府的组织与机构，且次国家组织日趋活跃和壮大，故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受到了挑战；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愈演愈烈，故围绕全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出现了全球社会与各种全球运动，等等。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和问题？其中的联系、规律和机制是什么？社会主义中国又应如何确立自己在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新阶段的发展路径？这一系列的问题亟待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回答。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上述两个方面困境的制约，学界鲜有对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世界历史理论层面的探讨。虽然学界也有一些相关创新，但都拘泥于枝节和表层，不能真正形成与西方全球化理论范式相抗衡的气候。这说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缺乏原始创新。原始创新重在相关新事实、新概念、新定律和新理论的发现与创立。对于基础理论研究而言，它更重在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的构建，这是新旧范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原始创新乏力，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低水平重复，而且也使我们既有的相关研究沦为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注释。

世界历史客观进程的发展和变化呼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而这种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必须首先是对既有理论研究困境的破除，即重塑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摆脱西方全球化理论研究范式及话语模式的束缚，以及构建能够科学解释世界历史进程发展中的新问题的新范式。而这些都不是通过对相关理论细枝末节的修改或者简单的扩展就可以实现的，它事实上要求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逻辑环节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即对既有理论的重新清理和对新理论范式的重新构建。对既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新清理是指对这一理论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问题等，从时代的高度做出新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考察、反思与检验，进而剔除其过时的成分、厘清模糊的部分、诠释新的意义等。而对新理论范式的重新构建是指通过对世界历史理论这一研究领域中一些最基本的预设、理论、范畴、问题、方法等的改变，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重新清理是重新构建的前提，重新构建则是重新清理的目的。事实上，在重新清理中往往蕴涵着重新构建，在重新构建中又实现了对既有理论的清理。而无论是重新清理还是重新构建，都需要一系列理论的创新和积累。本文仅从方法论层面来论述重新清理和重新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四个相互联系的逻辑环节。

（一）批判性重置前提性预设。前提性预设是一定时期内研究某一共同问题的学者所共有的对这一问题的基本事实及基本定律的共识，它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形成的。“批判性重置前提性预设”就是通过对既有前提性预设的批判与反思，确立新的前提性预设。进而言之，确立新的前提性预设往往发生在既有的相关理论无法回应和解释新问题的时候。目前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和各类西方全球化理论就处于这种状态，其具体表现有：或是仅把世界历史的主体视为民族国家；或是把“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相互混同；或是无视“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的区别；或是虽然初步意识到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的某些区别，但没有把握他们之间多层次的联系，更没有把握“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等。因此，我们需要在对相关既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加以批判性整合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并设置合理的前提性预设，以保证新理论范式的合法性。对相关既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的变更会影响人们思考和论述问题时的方法论，进而影响理论变革的方向。但要看到，这种变更十分艰难：一是因为前提性预设往往隐藏于理论的具体观点之中，很容易被忽略。如在既有的全球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就被长期遮蔽了。二是因为旧有的前提性预设非常牢固，其影响根深蒂固。不过，人类思想发展史表明，往往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少数学者率先发现问题，继而用新的前提性预设取而代之。

（二）提出和研究新问题。提出和研究新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大方向性意义的问题。而反观我国学界，就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内容而言，总是低水平地重复这样几方面的老问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渊源；世界历史的范畴和含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与历史形成过程；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与发展趋势；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认识和把握全球化问题的方法论意义，等等。虽然，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也有一些新观点，但总体上多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经典理论没有什么新意的挖掘与诠释，而缺乏新的能够反映当代世界历史进程变化的理论范式。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而言，在它还没有获得对这样三个层面上的新问题的科学认识之前，其“当代重构”是很难开始的：一是世界历史在当代的存在样态，如当代世界历史整体进程所处的阶段及其特点，当代世界历史的多元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特点，等等。二是世界历史的当代样态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演进过程间的互动关系，如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矛盾、动力、结构与演进机制，当代世界历史阶段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演进的影响和作用，当代世界历史演变中的民族、国家、地域乃至个人的作用及其未来命运，等等。三是当代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的规律和主线，如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与环节及其关系，等等。我们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之所以面临困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能从世界历史理论层面科学回答甚至提出这些新的问题。

（三）形成解决新问题的新分析框架。如果说，“批判性重置前提性预设”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提出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提供了新的方向，那么，“新分析框架”的提出则是这一理论当代重构的基本完成。新分析框架不仅可以解释新现象与新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旧材料和旧事实的重新加工，从而获得新的认识。目前学界既有的相关分析框架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单向性和绝对化。例如，或是把作为研究单位的“全球”绝对化，或是把作为研究单位的“民族国家”绝对化。实际上，当代世界历史主体的多元性、交互性以及结构的复杂性，都要求我们提出一种能够科学反映和概括当代世界历史主体及其结构特性的新分析框架。其二，束缚于以西方国家发展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分析框架。随着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整个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世界格局的改变，这种分析框架也应加以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关键与核心。因为，如果分析框架发生了变化，也就意味着该种理论产生了实质性变更。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分析框架，即“生产力—交往方式”的分析框架一直在我国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居主导地位，但因其分析过于宏观，且长期以来原始创新不足，致使其缺乏对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新特征和新问题的反映与说明。因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精神，同时又能科学反映和概括上述当代世界历史主体及其结构特性的新分析框架。

（四）形成概括新事实的新范畴。一种理论的“新分析框架”一经形成，在其基础上就会形成越来越多的概括新事实的新范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有着一套自己的范畴系统，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交往方式、民族、国家、世界市场、世界交往等。但当我们面对新的世界历史变化和世界历史事实时，我们就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制定新范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新范畴有些是完全新制定的，有些是对既有范畴的彻底改造，有些则是对既有范畴的重新运用等。当然，新范畴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每一个新范畴都是在“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新的世界历史事实及其关系的新概括，这绝不仅仅是言辞的变化。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但其基本上还未突破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范畴。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西方全球化理论中的很多范畴无批判性地引入相关研究，又制造出了不少混乱。因此，如何在“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制定一套新的世界历史理论范畴去概括当代世界历史的新变化，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而言，仅仅只完成这四个逻辑环节的变革是不够的，但这四个逻辑环节的变革会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其必然会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发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成功与否的关键。但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实现既需要长期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也需要来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涌现的新问题的激发，以及一些在这一领域极具理论敏感性与原始创新能力的学者的推动，因此这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突破点

如上四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逻辑环节虽然相互包含但又相互独立，不可能全部同时进行和完成，而是渐次出现并相互带动。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提出和研究新问题”及“形成概括新事实的新范畴”均需要一个缓慢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批判性重置前提性预设”和“形成解决新问题的新分析框架”则是在理论量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突破性质变。一旦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两方面的变革，将会极大带动学界相关研究的重大转向，因此，这两个环节的变革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中的重要“突破点”。

概观我国当代学界，有一些学者已开始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且其中一些论述涉及了如上两个环节的变革，这标示着我国学界开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征兆，是对既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这些突破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在方法论上提供了参考思路。

（一）一些学者开始了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前提性预设的反思与批判。如前文所述，“将世界历史简单等同于全球化”的观念，构成了我国学界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研究由以出发的重要的前提性预设之一。但一直以来，学界对这一前提性预设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论述较少，大多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进行“重复性”或“常规性”研究，就是泛泛地论述全球化、全球社会等问题。虽然也有少数学者对两者的区别进行了一些论述，如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产生时间、不同的发展线索、不同的发展趋势、不同的主体结构等[①]。但这些论述却普遍存在这样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不深入、不彻底。虽然表面试图论述两者的不同，但因为对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没有形成准确的认识与定位，因而，始终未能明确“全球化”与“世界历史”间实质性的区别，

①参见叶江《世界体系、全球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三期；周敏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第一期；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今全球化理论关系辨析》，《湖湘论坛》2005年第一期，等等。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最后只能又落脚到“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旧命题。二是一些观点简单化、片面化。例如,一些学者主张,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区别在于主体的阶级性,世界历史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而全球化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因此,两者的发展趋势必然也不相同。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来看,这种观点都是不合理的。再如,一些论述认为,世界历史的主体是民族国家,而全球化的主体除民族国家之外,还有跨国公司和各种社会组织等(1)。但世界历史的主体从来都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且其主体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因此,这也不是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真正区别。导致如上这些论述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它们都试图离开世界历史进程来谈论全球化,而结果证明,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既无法明确“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真正区别,更无法把握两者间真正的关系,因而导致在两者关系这一问题上,多数论述也只能是模棱两可,由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第一重困境。但受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逆流”的影响,有些学者开始反思和批判“全球化”范畴及其理论,为我们思考“全球化”及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例如,有学者基于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加剧、汇率政策的冲突等提出,全球化浪潮正在消退,在这一背景下再研究“全球化”似乎不够现实和科学(2);或也有观点更深刻地指出,“全球化”术语没有任何的学科依据,并不规范,因而,不能将其等同于“世界历史”,从而也不能把以“世界历史”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视为一种全球化理论,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是指导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全球化理论”[2]。对世界历史与全球化关系这一问题而言,这种观点的提出无疑釜底抽薪,切中肯綮。

从方法论上看,如上对全球化批判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需要对其做必要的补充说明。我以为,“全球化”范畴的非规范性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缺乏事实依据。国外一些学者在大量经济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出,现代的全球化不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主导的经济趋势是地区化,而且,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也说明“全球化”的真实存在需要推敲。二是缺乏明确的内涵界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对“全球化”范畴一直在探讨与界定,但歧见迭出,莫衷一是,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化”中的“全球”,是“地球”之意,“作为一个自然客体,地球会在天文学、地质学或各种生物科学中具有确定的位置……而一旦我们谈论到人类行为和观念领域中的事(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全球化具有了自身的位置),马上就会存在一些固有的限制”[3]。因而,“全球化”范畴始终“具有一种无法减少的不确定性和含糊性”[4]。三是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的一种现象和趋势,其自身还有待解释说明,而直接将有待说明的事物作为解释一切的原因,这至少是不严谨的。因此,要把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就必须用“世界历史”来解释“全球化”,而不是相反。从合理的方面来看,“全球化”这一不规范的术语实际上只是对世界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某些特点的不准确的称谓,它产生于世界历史进程,从而只能由世界历史的发展来加以说明。这种批判性认识将开启对“全球化”、“世界历史”以及两者关系的深入反思,势必将直接动摇既有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和各种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基础,是一种“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5]。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在分析框架上开始出现原始创新。近年来,不少学界同仁也开始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研究中存在的困境,也有学者试图对这些困境寻求突破,但一直不得要领。从方法论上看,其根本性原因就在于相关的新分析框架尚未构建。新分析框架是新的理论范式的核心,决定研究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当然,新分析框架的构建是有其现实基础的,而不是研究者随意杜撰出来的。一定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其现实基础是一定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在马克思创立其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各个自然形成的孤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域与要强行打破这种自然限制,使各

(1)参见张文伟《“全球史观”视阈下当代世界历史的“半全球化”特征》,《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十期;杨学功、孙伟平《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四期,等等。

(2)参见翟东升、李源正《去全球化浪潮下欧洲和平分家》,《社会观察》2012年第十一期;何志鹏、王倩《去全球化浪潮下自由主义之再省思》,《江海学刊》2009年第五期,等等。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个民族、国家和地域间的世界交往关系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之间的关系。因此，如前文所述，“生产力—交往方式”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析框架。就解释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的动因与发展趋势而言，这一分析框架无疑是正确的：科学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初期的世界历史中各民族、国家、地域间交往的特点、机制和规律，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趋势。毫无疑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迄今仍然显示着其科学价值。但我们也应看到，世界历史的主要矛盾在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新变化，即出现了与国际社会相对应的、以多元化的世界历史主体与日益增多的全球问题为基本关系的全球社会。因此，必须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中的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的关系成为一些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但由于没有形成新的分析框架，故关注的指向比较混乱：要么是偏执于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而忽略了“全球社会”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或是偏执于“全球问题”和“全球社会”的研究，而忽略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社会”的影响；或是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忽而跳到“国际社会”，忽而跳到“全球社会”，从而引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显然，这是由于缺乏新的分析框架所致。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学界有的学者的相关成果在这方面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2年，叶险明教授基于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批判，以及对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的多层面的关系的分析，提出了“世界历史‘双重结构’”这一新分析框架，指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及其相互关系越来越凸显出来”[6]。应该说，这一新分析框架不但合理地诠释了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确实把握了当代世界历史新的结构性特点及其发展的主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面对全球人口增长、全球贫富两级分化、全球贫困和失业、全球环境问题、全球能源危机、全球犯罪、全球核安全问题、全球资源匮乏等新问题，所有民族国家确实都受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矛盾及其发展的制约；近年来联合国每一个关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框架公约的制订与形成，实际上也都是在这两种相互渗透的社会间关系中寻找平衡与共识的结果，因此，“世界历史‘双重结构’”这一新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但“世界历史‘双重结构’”这一分析框架也存在很多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世界历史“双重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具体机制是什么？世界历史“双重结构”对世界历史各种类型主体的影响有何不同的特点？等等。因此，其还并不完善。但它对当代学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原始创新的标志，其不但摆脱了目前学界相关分析框架的“单向性和绝对化”，而且打破了长期以来“以西方为尊”的分析框架。如果我们日后能继续深入探讨和解决这方面问题，且围绕这一新分析框架提出更为系统和丰富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将有可能构建一种既能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精神，同时又能科学反映和概括当代世界历史主体及其结构特性的当代世界历史理论新范式。

综上所述，我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困境及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状况会直接决定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命运。但在学界呈现出的一些突破点已经为我们显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端倪，让我们看到了有的学界同仁试图突破既有理论研究困境的努力与原始创新的能力。这种努力和能力不仅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同时也会在方法论上带动与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

[2][6]叶险明.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12，(6)：4-23.

[3]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41.

[4]万永彪，魏海安.马克思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理论的比较分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08，(4)：51-52.

[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3-84.

责任编辑：黎伟盛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